

# 为了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

## 大爱无边：周恩来的亲情世界

许小康

周恩来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 一、珍爱亲情，有情有义

人都有三亲六故，周恩来也同样的有自己的亲眷。但是周恩来从小就厌恶那种家业兴隆时，宾客如云，趋之若鹜；家道衰落时，则惟恐避之而不及的势利小人。无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了共和国的总理后，他都始终如一地珍视亲情，有情有义。

周恩来一生热爱父母，对养育之恩看得极



周恩来和邓颖超与周秉建合影

重，时常因为革命需要不能多尽人子之孝而自责。但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大孝之人。周恩来12岁即远离家乡，自此与父母聚少离多。1942年7月中旬，父亲周绍彬突然中风，送医院抢救无效在重庆病逝，周恩来闻讯后，在父亲的灵堂前失声痛哭，悲痛之极竟昏倒在地，令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在敌人面前无比刚强的周恩来，面对亲人又是无限的情深，他坚持拖着刚做完手术的病体为父亲守灵，没有人能劝他休息，没有人能劝他离开，一直守到起灵。

周恩来的3位母亲，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蒋氏，都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却均逝世较早，对她们，周恩来都深怀孝敬之心和怀念之情。所以，当他为了抗战、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局奔忙而不能去为母亲祭扫坟墓时，他总觉得对不起他的母亲。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招待会上，他沉痛地对记者说道：“38年了，我没

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这是怎样的赤子之心！

周恩来对长辈的尊敬之情，一直被亲友传为佳话。1939年3月，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往浙江西部视察工作，顺路回绍兴省亲。有一天，他的姑父王子亲先生来访，周恩来恭恭敬敬地请王先生进入室内，并将他推至上座，自己完全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接待，丝毫没有“政府要员”的架子。后来，周恩来见到周氏族族长周希农老先生时，立刻恭敬地向周老先生三鞠躬，然后，推老先生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恭听周老先生介绍绍兴周氏族中的一些情况。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与兄弟们手足情深。

1950年8月25日，与周恩来童年一起长大的表哥万叙生来访，两人从童年一直谈到今天，表哥讲了自己坎坷的一生，觉得自己为生计所迫受尽了煎熬，现在解放了，打算过个安闲的晚年。但周恩来劝他：“现在在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劳动光荣啊！按你的年龄，还可以为人民干十五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比较职位，不比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但对于表哥的实际困难，他拿出60元钱和一些衣服以示救助。万叙生回到扬州，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通过努力工作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先后被选为居委会主任、人民陪审员、银行协助储蓄员、税务所税务员等，干出了很多为人称道的实绩。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但要求极严。他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上发出“盛世危言”的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407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而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对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周恩来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周恩来称赞说：“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

### 二、慎待亲情，不徇私情

周恩来重亲情却从不为亲人谋私，重情义却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十分痛恨那种“好

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因此，执政后，作为总理，他首先对自己情深意笃、患难与共的妻子高标准严要求，从不以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代替严肃的政治关系。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巾帼女杰走上了各种领导岗位，论才华、威望、资历，邓颖超在政府里任一个部长谁也不会有疑问。但周恩来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55年确定工资级别时，中央批准邓颖超为五级，但周恩来却把她压为六级。1974年，毛泽东批准邓颖超任人大副委员长，但周恩来却又把批示压了下来。总理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邓大姐知道总理这样考虑问题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是在慎重地对待人民赋予他手中神圣的权力。

周恩来历来十分注意不受亲属的一些错误思想所左右，他曾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因此，他给自己的亲属私定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到北京看望；来者一律住机关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就餐；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准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许说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来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周恩来的兄嫂曾想让他给找个职位。他在回信中的答复是：“人生赖奋斗而存。”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为国家总理，但对亲属从严要求，绝不允许仗仗他的权力和地位，有任何特殊。他的亲属们到越边远、越艰苦、越基层的地方，越符合他的要求。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女方在淮安县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妇关系，把女方调到北京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说明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他们也要带头执行。并对他们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学校里学的东西也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嘛。这样，两人愉快地回到了淮安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时，他们还在淮安中学当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入伍了，总理听说后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就派乔金旺和赵伟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问北京军区机关的招兵部门，都说没有首长打过招呼。又去新兵团找到秉建，秉建说：“并没有人打什么招呼，是我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乔和赵说：“你伯伯的意思还是让你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怎么办？”秉建说：“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乔和赵又问：“你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吗？”秉建说：“那我得

听伯伯的话。”乔和赵回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坚持让侄女回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乔金旺同志后来回忆说：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样子，拿那里当跳板；二是为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 三、超越亲情，大爱无边

周恩来的亲情冲破了狭隘的世俗范畴，融入了广阔无垠的爱的大海。他的爱超凡、无私、博大，他把爱无遗地播洒给了他热爱的党、祖国、人民、同志、亲人等，而唯独没有他自己。在条件特别艰苦的战争年代，当缴获一点敌人的食品等时，都属给他送来了，他首先想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有没有，机关同志有没有，如果没有，他是决不会自己单独享用的。在危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舍己为人。有一次周恩来乘飞机飞越秦岭时，由于遇到了强大的冷气团，机翼严重结冰，压得飞机直直下降，密集的冰雹猛击机身，打得叮当响。为了减少飞机重量，大家把机梯、小桶、行李等物件都扔了下去，但飞机仍然下沉。情况已经万分紧急，机组人员通知大家背降落伞，准备必要时跳伞。这时，周恩来发现同机去的叶挺将军女儿小扬眉哭了，赶紧走到她跟前，发现她没有伞包，立即把自己的伞包给扬眉背上。然后，把她抱在怀里并安慰她要像她父亲一样坚强。后来，飞机折回西安安全着陆。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他把自己的应急伞包给了孩子，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周恩来一生视人民如天，视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的感情热烈而深沉，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的坑害人民之事，人民的任何一点苦都引起他的重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得知革命老区人民粮食严重不足时，掉下了眼泪，自此，他规定自己不吃任何荤菜。此外，他还同服务员一起商量节粮的办法，与社员共同研究食堂问题，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部队察民情，及时解决人民的痛苦。他为人民忘我地工作，几乎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就是在1972年，他身患癌症，又正处在“文

化大革命”的处境维艰之中，但为了减少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他也不顾病情严重，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保护了一大批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苦心维护着国家生活的正常运转。就是在上手术台之前，打过麻醉之后，他还坚持办公，用颤抖的手写了批示和签名之后，才让做手术。

从1975年3月—9月间，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当时他已经是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且患了晚期癌症，还这样拼命地坚持工作，这种“忘我”、“无我”的精神，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昏迷不醒。就是这样，他还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他躺在床上，发着烧，体温高达38.7度，一边吊着输液瓶子，一边同罗青长谈工作。其间，他两次被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休息一会再谈。他为人们耗尽了最后的一分力，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周恩来一生无积蓄，他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做到了“取之有道，用之有方”。从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以来到1976年1月



墨西哥客人随周总理到郭风莲的家

他逝世，总理每月工资404.8元，邓颖超是343.7元，他俩的开销除支付生活费以外，其他主要用于五个方面：一是资助亲属；二是补助生活困难的包括身边工作人员；三是抚养烈士后代；四是开会人员和客人的餐费；五是上交的党费。据初步统计，周恩来、邓颖超用于补助工作人员的工资有10218.6元，资助亲属的钱有36645.5元，拿出节余的钱先后三次交党费共14000元，仅上述三项支出高达60864.1元，相当于12年零5个月的工资。在“金钱观”上，周恩来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一次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在一次会中，总理向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去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我猜想秘书大概是这么说的）。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我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时间很晚，从前都是部门的领导去，我们听传达。1967年我才开始参加。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冬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我写的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在档案中有一个，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

了解，意见书中错误一定不少。

记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参加人大的会议，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等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她跟我说起来，问我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的，我说起小学是在师大附小上的，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二十年代初。她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所以邓颖超同志还是我的老师呢！我问过她没教过我。她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搞火箭、导弹的，并且介绍了一些搞导弹的科技人员，他们不怕艰苦和危险。我们那时期的导弹叫做“东风二号”，是最早自己设计的导弹，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试验时都快发射了，出了问题。要把液氧卸下来，阀门又不灵了，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上去处理，那很危险啊！后来她把这件事对总理说了，说错了，说成原子弹。以后她又见到我，告诉我，总理对我说：“你搞乱了，他不会跟你这么说的，他是搞导弹的，不是搞原子弹的。”邓颖超同志对我说：“我是会搞错的。因为我与恩来约定好了，不该我管的事，我是不同的。恩来不清楚是导弹还是原子弹。”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早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谈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一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如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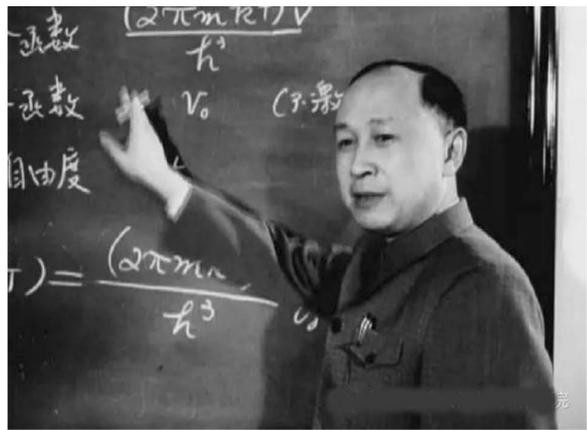
“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期下有重大意义。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多得很，有道理，不可不见得多。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平衡，最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也不是一个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像我刚才说的新任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总设计师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

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会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会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铁路运输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钮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着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但是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做出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的活来！”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人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周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赵春生整理)